

诗经史 学

(上册)

洪湛侯 著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诗 经 学 史

(上)

洪 湛 侯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学史/洪湛侯编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ISBN 7-101-02824-1

I. 诗… II. 洪… III. 诗经—文学研究—史料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7805 号

责任编辑: 张荷 张耕

诗 经 学 史

(全二册)

洪湛侯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7³/8 印张·633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46.00 元

ISBN 7-101-02824-1/I·375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总 序

傅璇琮

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于几年前即提出编辑《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起步并不太快。经过几年的准备,穆克宏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将在今年出版。如何使这套史料研究丛书能加快进行,以适应当前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需要,古典文学编辑室徐俊、顾青两位主任曾几次与我讨论,现经商议,确定由我担任丛书的主编,负责整体构思与组稿。作为中华书局总编,我也有责任把这一不算太小的文化工程承担起来,希望在以后几年内这套丛书能粗具规模。现在已经组约的,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曹道衡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马积高先生的《赋体文学史料》,湘潭师院中文系陶敏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还有带有学术史性质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其他尚在陆续联系中。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取得学术界的广泛支持,中华书局的这套书,定将会有不小的规模,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这里面就有一个对工程整体结构进行了解、分析和设计的问题。八十

年代中期,我曾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倪其心教授及已故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沈玉成研究员就此进行磋商,后即以《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为题,撰文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上刊载,表述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全面切实探讨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取得整体了解和认识,是进行宏观控制、微观审视的依据。有了整体结构观念便可更真切了解近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在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各方面,有哪些成果和成就,还有哪些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哪些方面应当突破和开拓,哪些门类可开辟新分支,等等,从而可以更科学地择定重点项目和课题。

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实施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实施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其具体内容,如:(一)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包括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二)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包括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包括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或索引、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

上层结构范围较广,很难全面罗列,就现在想到的,大致有:(一)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文学样式、文学流派的专题研究,以及文学通史、专史的撰著。(二)作品的批评鉴赏,包括古典文学各种方式的普及工作。(三)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与音乐、美术、建筑、宗教、民俗、服饰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四)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以及古今文学比较、同一主题创作的历史比较。(五)新分支学科的开辟,如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又如搜集

古典作家作品的图录、碑刻、手迹等文物,分析它们在作家创作、作品传播、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以及它们自身的特点,开辟一门古典文学的文物研究。(六)方法论的研究,包括传统的、现代的、一般的及具体方法的研究。(七)学科史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及古今杰出学者的研究。

从以上并不完全的叙述来看,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内容是十分宏富的。基础实施与上层结构的结合,必更能发扬古典文学的精华,深入探索艺术规律,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当代创作,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自身的贡献。

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主要涉及收集、审查、了解、运用史料问题,因此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上述的基础实施,但应当说它是涵盖以上两方面的内容的。它的触及面可能还要广,举凡与作家作品有关的史书(如正史、别史、杂史等)、地理、各种体裁的笔记、社会民情的记载等等,都应有所述及。而且它还与其他一些学科有所交叉,特别是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史料检索学等,关系更为密切。古人说,六经皆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代包括经史子集中的典籍,都与文学史料有关。而且文学史料还应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学术进展线索。我们的史料学研究不能只看古人,更应注视现实,及时反映新的成就。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增加研究和撰述的难度,但同时对于应用者来说,则是由此获得仅靠一己的努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的众多、有效的资料。这将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本世纪学术的回顾和总结,对于二十一世纪学术的迎候和奉献。

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种文学史著作已是一个热点,不断产生。这些著作当各有其特点。我们想,我们这套史料丛书,将是各种体裁、各种观点的文学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不管写怎样的文学史,不管研究哪一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不管是教师和学生(包括

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将参考这套史料书。我们抱着为研究者、教学者服务的态度,希望在学术工作中做一点真正有用的实际的工作。

从史料学的建树来说,哲学、历史学已经走在文学的前头。早在1962年,冯友兰先生就出版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本书虽不到二十万字,却是建国以来文史哲类史料学的开山之作。书中概述了商周至民国初期的各类哲学史籍,语言明晰,条理清楚,而又评价得中,表现了一位哲学大师高深的学术造诣。嗣后有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科学》(三联书店,1982),刘建国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科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历史学方面,有陈高华、陈志超诸位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科学》(北京出版社,1983),这是通史性质的。其他还有断代的史科学,如黄永年、贾宪保先生的《唐史史科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冯尔康先生的《清史史科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张宪文先生的《中国现代史史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另外如谢国祯先生的《史科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翦伯赞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荣孟源先生的《史料与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则是通论性的。比较起来,古典文学这方面的成果则较少。我现在看到的只有两种,一是潘树广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科学》(黄山书社,1992),一是徐有富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这两本都是通论性质的,前者分“史源论”、“检索方法论”、“鉴别方法论”、“文学史料分论”(按文体分)、“编纂方法论”、“现代技术应用论”,后者分“文学史料类型”、“文学史料鉴定”、“文学史料整理”、“文学史料检索”。这样通论性的著述当然是需要的,但我们想,为了使读者具体掌握文学史料,还是按时代、按作家作品系统地论述,较切实用,因此我们拟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时代分

(但不拘泥于某一朝代),一种是以文体分。既概括地叙述各种史料,以史料介绍为主,也可以从学术史角度,论述历代的治学思想和研究实绩(如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把史科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这将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治学路数。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治学路数必将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树立一种新的标格。

一九九六年六月

自序

《诗经》是中国文学辉煌灿烂的源头，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自战国末年被列为“经”，诗旨被歪曲而诗文却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亦不幸中之幸。

二千多年以来，有关《诗经》的论著，数以千计，是我国古代典籍中说解最详、派别最繁、争议问题最多的书。这些著作，有阐述诗旨的，有发抒义理的，有研究训诂的，有校订文字的，有剖析音韵的，有考察名物的，有探讨山川地理的，有讨论典章制度的。有的概论全书，有的分别论述各类专题，真是应有尽有，惟独关于《诗经》研究史的专著，却甚罕见。清代和近代几种经学历史和经学概论，虽然述及《诗经》，但都是从经学观点立论，今已不切实用。近二十年来，曾有一些论文和论文汇编，论述历代《诗经》研究概况，总结既往，论议得失，斐然成章，有足观者，可惜还不是系统的《诗经》研究史专著。

八十年代初期，我应邀参加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接受分配，撰写“历代诗经研究”等条目。当时曾想，如能扩大其制，写成《诗经》研究史专书，对于今天的读者或者更为有用。只以学浅力微，未敢轻试。1988年中华书局约我撰写《诗经学史》，谬承信赖，自然乐于从命。既而草拟提纲，筛选资料，难题纷至沓来，又开始懊悔不自量力，忧心忡忡。既已应诺在先，箭在弦上，只得悉力以赴。十年中曾经两易其稿，多次删改，今全稿粗就，略加回顾，感受弥多。

两次易稿,重新改写,都是在完成了一项《诗》学书评的大型课题之后,因工作之便,看到一些平素不易看到的书籍资料,开拓视野,从而得以充实书稿。1989年冬季,我应邀赴美,在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讲学,傅璇琮先生从北京来信,委我为他主编的《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撰写全部《诗经》条目近百家,其时手边无书,幸好我正在帮助科罗拉多大学筹建东方图书馆,可以请他们协助进行馆际互借,在一年多时间里面,借阅《诗经》类图书和其他参考书籍二百余种。科罗拉多大学又为我提供方便,帮助我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密歇根大学东方图书馆看书、查核。由于美国朋友在图书资料上的支持,《诗学大辞典》中《诗经》类稿件基本上都是在访美期间写成的。阅读资料既多,回过头来看看原先草拟的《诗经学史》初稿,愈觉拉杂肤浅,不成体系。1991年9月回国以后,遂开始作了第一次的改写。

1994年编写《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开始启动,撰写经部书目提要工作亦同时展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处聘请我担任《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特约编委,并委托我提出《诗》类选目初稿,经三个月,始从一千余种《诗经》著作中筛选出140种,后经编纂处向全国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做了一些必要的更换删补,最后确定《续修四库全书》收《诗》类著作105种。编纂处决定委托我开始撰写《诗》类提要初稿。蚊力负山,自知不称,坚辞不获,又只得龟勉以赴,历时二年,写成《诗》类提要全稿百分之六七十。而我又有访美之行,于1996年6月来到美国芝加哥。感谢《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处与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系和东方图书馆取得联络,在资料上为我提供方便。在芝加哥时,我又写成两批提要稿件寄回北京,终以《续修四库全书》所收《诗》类著作,其中的海内孤本、名家未刊稿本以及宋元刻本后世无复刻者,都只能仰求于我们国内的藏家,美国几家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对此类中国独有的稀世之珍,皆无从置备,因

此,撰写提要的工作不得不被迫暂停。于是我又可以腾出时间来修改自己的《诗经学史》二稿。由于近几年来涉猎的《诗》学著作较多,“观于海者难为水”,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修订稿,仍然漏略殊多,不免茫然自失!于是痛下决心,再做第二次大修大改,历时半载,改稿基本定型,而年事就衰,心力亦已瘁矣!

综览全部书稿,并无惊世骇俗之论,更谈不到有所发明,只是根据二千多年的《诗》学研究史实,分门别派,推寻特点,略加评介而已。其中,关于《诗》学研究的分期问题,关于《诗经》史科学对于《诗》学研究的作用问题,关于二千多年以来《诗经》经研究与文学研究并存问题,以及关于《诗》学评论如何掌握客观标准和适当分寸等问题,都提出自己的看法,书中也是按照这些看法加以论列的。是否有当,还值得提出探讨。

一、确定以《诗经》学派盛衰消长为依据的分期标准

二千年来,在《诗》学研究领域里,今文与古文之争,官学与私学之争,郑学与王学之争,南学与北学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考据学与义理学之争……派别林立,纠缠不休,这些都是历史上发生的无法回避的事实,撰写《诗经学史》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如何分编分章也颇费踌躇。历来经学史所述《诗》史,总是从汉代谈起,晚近一些论述《诗》史的文章和有关论著,对于《诗经》研究的下限,往往只写到“辛亥革命”为止,这种论述“诗经学史”始于汉代、终于清末的做法,不仅不合史家编纂之道,亦与真正的史实相违,殊不可取。然若采取根据历史朝代分期,固然方便,但是《诗经》的学派往往横贯数朝,以历史朝代划分,无从反映学术演变的特点,再三思考,决定采用以占主导地位的《诗经》学派之盛衰消长作为学术分期的标准。分为“先秦诗学”(周至秦)、“诗经汉学”(汉至唐)、“诗经宋学”(宋至明)、“诗经清学”(清)、“现代诗学”(民国至现代)五期。这样划分,大刀阔斧、脉络分明,给读者的印象,可能也比较深刻。“先

秦诗学”注重应用,“诗经汉学”注重训诂,“诗经宋学”注重义理,“诗经清学”注重考据,而“现代诗学”则以从文学角度研究为特征,这些也都因为分期明确而更加突现出来。

二、采取以史料学为基础,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写作方法

上述《诗》史的分期和定名,都是以史料为依据来确定的,因为不是按朝代划分,不是同时各学派都一一并列,而是抓住一个大的学术历史阶段中的主流派,加以区分和命名,其他非主流派只能附带述及。例如从现存的《诗经》史料看,在自汉至唐这一千年的历史中,《诗》学的主流派应该是以古文《诗》学为特征的《毛诗》学派。虽然今文三家《诗》学在汉代曾相当盛行,然汉后即渐亡佚,《毛诗》虽稍稍晚出,然汉初也已流传于民间,东汉郑玄作《笺》以后,流传益广,影响益大,自汉末经魏晋南北朝以迄于唐,都是毛郑《诗》学的一统天下,成为《诗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派,而且这一学派的史料,至今还完整存在,把它列为“诗经汉学”的正宗,自无不可;今文三家之学,则在叙述《诗经汉学》的同时,述其源流嬗变之迹,附及之可也。至于宋代出现的以朱熹为代表的“诗经宋学”,早已成为当时《诗》学的主流,虽范处义、吕祖谦等少数学者仍宗毛郑,但已不成气候;自元迄明,科举取士,皆奉《诗集传》为圭臬,自延祐颁为功令,直至明末,《诗经》之学,几为朱熹《集传》一家所囊括,名之为“诗经宋学”,早已为论者所认同。

至于“诗经清学”,自亦有说,虽然康雍之际,汉宋兼采;道咸以后,今文三家又一度复兴。然而综览清代三百年中,以文字、声韵、训诂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者以及嘉道间的《诗》学专家,对《诗经》的研究,造诣宏深,早已超越汉唐,自成流派,特点突出,成绩显著,名之为“诗经清学”,自然更无不合。总之,如此定名,皆以大量史料作为依据,并非凭空造作、主观臆定。

以史料学为基础撰写学术史,是傅璇琮先生治学的重要见解

之一,卓识宏议,给我的启迪和影响极大,至于“以史带论,史论结合”注意点尚多,书中叙述,随时都注意体现,此不赘述。惟评论必须注意识别学术的性质和重视社会思潮对学术的影响两点,意义深长,这里拟再加讨论。

史论结合,首先必须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分析和识别学术思想的性质。“先秦诗学”、“诗经汉学”、“诗经宋学”、“诗经清学”的本质属性都是经学,这个前提必须先确定下来,评介方才不致走入误区。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诗》学研究者,孔门《诗》学是先秦《诗》学的主体。孔子说《诗》,既论乐,又说义,说义部分有关《诗》的文学特点论述,自应视为《诗经》文学观的滥觞,然而孔子论《诗》的绝大部分后来却都成为儒家“诗教”的核心。后人把《诗》三百篇看作封建伦理道德的教科书,上溯渊源,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这样逐一进行具体分析,评论方能各得其所。此外,对于历代各家说《诗》的观点,也应该分清它的阶级属性。以比较熟悉的《诗》家为例,欧阳修的“刺淫”说,朱熹的“淫诗”说,乃至清代姚际恒、崔述的“王化”思想和贞淫观念,都是封建意识;宋末王柏“删诗”和以后诸家反对“删诗”都是为了“卫道”;清人津津乐道的“白鹭洲主客说诗”,杨洪才提出“《郑风》多淫诗”之说,毛奇龄谓“三百篇皆可施于礼义”,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在《诗经》研究史上,这一类例子简直举不胜举。对于这些,自然不能漫无分辨地浑加称誉。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个作家的多种同类作品,有时性质也不尽相同,如清初王夫之的几种诗学著作,《诗译》是历史上第一部从文学角度论《诗》的专著,完全属于文学性质,然而他的《诗经稗疏》等,则仍然还是经学著作,这一类情形,不得不区分看待。

说到社会思潮对学术的影响,时至今日,似乎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性问题,然而一联系到学术思想发展的实际,则又颇有一些事例,引人深思。

唐初《五经正义》编成，经说归于一致。当此之时，成伯玟、韩昌黎开始对《毛诗序》提出质疑，竟未能引起人们的注视，音过声熄，尔后即悄然无闻。宋初欧阳修、苏辙亦对《毛诗序》产生怀疑，欧疑“《二南》序说不合者尤多”，苏则仅取《诗序》首句，余皆弃置不用。当时影响不过如此而已。庆历以后，新说渐起，疑经改经蔚然成为社会风尚。朱熹作《诗序辨说》，力斥《序》说之非；作《诗集传》，弃《序》不用，惟就本文作解，成为“诗经宋学”立宗开派的一面旗帜，此皆社会思潮推动所致。宋代的思辨思潮推动了《诗》学革新，《诗》学革新转而又丰富和发展了思辨思潮。这是社会思潮对学术研究所起的正面影响的一例。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古史辨”派，论《诗》并没有突出的理论建树和重大发明，但是因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它取得超乎原来意想以外的效应，也是这样的例证之一。

清代具有反传统思想的姚际恒、崔述、牟庭诸家，生当考据学兴起以至极盛的时代，疑古之说为信古思潮所掩，姚、崔、牟庭怀疑旧说，时创新解，对《诗经》各类有争执的问题，提出异议，只以所论与乾嘉《诗》学之恪守毛郑、注重文字考据者异辙，虽一时也荡起微澜，但很快就风平浪静，在学术界未能引起相应的影响。乾隆编《四库全书》，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摒而未收，《古今伪书考》亦不过附于《庸言录》中存目而已。这是社会思潮对学术研究所起的负面影响的一例。

上述正反两例都说明个人的发明和发现，如能适应社会学术思潮，就能得到肯定和发展；反之，如与社会思潮格格不入，不免会湮没无闻。学术兴替，内因虽是主要因素，但同样不能离开它的外部环境，同样存在一个机遇问题。

三、注视并研究《诗经》文学观开端、延续和发展的轨迹

《诗三百篇》成为经学，已逾两千年之久，但《诗经》本身绝大多

数是文学作品、抒情作品。在经学统治学术思想界的漫长岁月里,《诗经》的文学观如何保存和延续下来,这已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而又富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课题。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诗经》只是经学,没有文学性质,那又怎么说《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又怎么解释“风雅比兴”的文学优良传统?为什么人们谈到文学,会把《诗经》与《楚辞》并称“诗骚”?为什么屈原的《橘颂》和曹操、阮籍的四言诗会被誉为“《诗经》的遗风余韵”?著名的文论家刘勰、钟嵘为什么要高度评价《诗经》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而唐代陈子昂、李、杜、元、白等大诗人都要不约而同效法《诗经》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发扬“风雅比兴”的优良传统而写下那么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佳作?这些都说明《诗经》原来就是文学作品,说明历史上在进行经学研究的同时,另外一些学者还在从事《诗经》的文学研究,只不过很少留下系统论述《诗经》文学的专书而已。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研究《诗经》的第一人,他所说的“思无邪”,所说的“兴、观、群、怨”都是从文学角度着眼的。孔门弟子中,长于文学的子游、子夏同时也是学《诗》最有成绩的人。本书对于这一点特设专章加以阐扬,以示《诗经》文学观的渊源有自。此外,本书每编皆设专门章节论述《诗经》的文学研究,而第五编“现代诗学”则更是围绕“诗经文学研究”为主要特征来叙述的。

四、评论要实事求是,不曲循旧说,不苛求古人

论史之作,势必涉及人物评价。对于前人论《诗》是非功过的评论,都应比较慎重。我经常提醒自己,切不可从个人好恶出发,感情用事,扬之升天,贬之入地,失却公允。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对于如何看待前人的失误,曾提出过非常恳切的意见。他说:“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评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切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观耳。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

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千虑容有一失……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他还提出,评论古人有几点必须引起注意:一是“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答王西庄书》);二是不可小题大做,哗众取宠;三是不可以褒贬自任,苛求古人(说详《二十二史考异·自序》)。所言很可作为借鉴。

今天,我们评论人物,自应遵循唯物史观,运用历史观点,把人物放到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衡量,实事求是地评论其功过得失,不扣帽子,不贴标签,措辞用语都掌握一定的分寸。本书涉及论人论事的地方很多,是否得当,实在不敢自信。这里不过述其撰写时的初衷而已。

本书最后一节为“《诗经》研究的反思与展望”,总结历代《诗经》研究的得与失,以肯定成绩为主,同时也指出古代《诗》学的许多弊端。诸如为了解经,为了宣扬“诗教”,或是为了科举作文,不惜烦琐考证、穿凿附会、立异标新,将读者带入误区,造成这样那样的恶劣后果。而近当代较常见的缺点,更多的则是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低水平的重复。这些,有的已经扭转,有的则正在克服。当前面对的下一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诗经》研究自然也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以进一步深化《诗经》文学研究为主导思想,普及、提高并重,从而把《诗经》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近数十年来,在《诗经》文学研究的普及方面,成效显著,但是在理论研究、史料辑集和文学的宏观研究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当前,观点正确、内容新颖、质量较高的“诗经概论”、“诗经研究史”、“诗经文学研究”之类的专门著作,很少能够读到。全国性的“诗经著作总目”、“历代诗经论文总目”、“诗经著作提要”等专著甚至还是阙门。历代笔记中的《诗经》史料,历代文论家、文学家

评述《诗经》的言论,明清《诗经》评点本中有关文学技巧的评语,都还有待辑录成编。《诗经》研究有着大量史料辑集工作要做。随着全国善本古籍调查摸底编成总目,全国的《诗经》善本已在掌握之中,现在大可利用这一优越条件,将一些深藏密锢的《诗经》稀本书籍,如名家稿本、名家校本、宋槧元刊、海内孤本、流传稀少的旧抄本,择要影印,以广流传,以裨实用。为此,不揣鄙陋,建议编辑《诗经大系》,下分若干系列,如《诗经珍本系列》、《诗经史料系列》、《诗经专著系列》、《诗经专题系列》、《诗经名物今释系列》等。所谓“大系”,取其无所不包,所谓“系列”,取其连续不断。这些设想之能否实现,当取决于出版界的支持。

本书既以《诗经学史》命名,自然还应该谈谈对“诗经学”一词的认识。什么是“诗经学”,至今还没有比较明确的定义。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诗经学是研究《诗经》的内容、性质、特点、源流、派别的一门学问。在封建社会里,诗经学以经学研究为主体,但也存在着关于文学特点的探讨。现代诗经学,则以诗经文学研究为核心,各类专题研究同时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看法,自知是很粗略的,这里一并提出向高明求教。本书舛谬之处必多,衷心盼望广大读者和《诗》学专家多予匡正,孟子不云乎:“由(犹)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下》)读书太少,见闻有限,惟尽心竭力以抵于成而已耳。是为序。一九九七年九月洪湛侯写于美国芝加哥。